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当代中国的长期建藏思想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为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西藏与内地的共同繁荣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放弃了进藏部队“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的最初设想,逐渐确立了扎根西藏、边疆为家的长期建藏思想。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加快西藏发展”、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逐渐探索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办法,这既是对长期建藏思想的丰富与补充,也是实现长期建藏目标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60多年来党的治藏方略,提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赋予长期建藏思想新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含义。通过梳理长期建藏思想的来龙去脉,总结长期建藏的历史经验,为新时期西藏工作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7期)

近代云南藏传佛教发展初探

相比西藏、四川、青海与甘肃地区的藏传佛教,云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相对较晚,近代是它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民国政府加强了对云南藏传佛教的管理,保留了清代的优待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云南迪庆藏传佛教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云南丽江地区藏传佛教进一步加强了与汉文化的联系,社会地位稳步提升;受西藏、西康等地“藏密东传”的感召,云南藏密由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高僧首次传入昆明、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成为近代“藏密东传”最后一批进入内地的藏密力量。近代云南藏密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与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邵逸舒,周润年,文厚泓,《西藏研究》2017年6期)

唐论惟贞墓志及论氏家族源流事迹再考

论惟贞为唐代著名的吐蕃族裔,其家族数代为吐蕃与唐朝所倚重。其本人《新唐书》有传,但事迹颇为简略。其墓志的发现,首先为该家族史的研究又添一新史料。根据其墓志,该家族与吐蕃王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而并非王族。其墓志多处可补《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史籍之阙;史书碑铭对其家族多位成员之官爵记载不一的原因,是他们生前或死后,因论氏子弟功勋再著而家族不断得到新的封赏和追赠的缘故;志主个人的发迹与其家族在历史上的二次光显,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该家族又以戮力勤王,效忠王室而再振家声。志文对论惟贞及其家族的勤王平叛事迹亦多有补正。(李宗俊,《中国藏学》2017年3期)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边境旅游扶贫开发思路及模式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藏作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前沿,西藏边境地区精准扶贫也提上了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日趋紧迫。2017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脱贫攻坚工作会议,提出做好边境脱贫的重要部署。然而西藏边境地区是西藏乃至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也是难点。西藏边境地区距离经济中心城市较远,拥有4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接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贫困现象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是影响西藏社会进步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西藏边境地区贫困问题研究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西藏边境旅游成为边境地区社会经济进步的亮点。文章基于旅游扶贫与边境旅游问题研究,提出西藏边境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的思路,指出边境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有:生态文化旅游扶贫模式、民俗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贸易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徐宁,图登克珠,蒙媛,卓嘎措姆,《中国藏学》2017年4期)

学者的角色:美国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者与对华政策制订

在美国涉藏、涉疆政策的形成中,学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令人值得玩味的主题。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美国政府极少雇有专业的藏学家、新疆研究者,但他们在制订相关政策时也需要听取专家的看法。不可否认的是,搞清楚学者与美国涉及中国西部边疆的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将会有利于我们定位这些专业学者在具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文章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在美国从事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研究的学者介入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以及具体的活动,进而分析他们在

政策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励轩,《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6期)

文物视野下清朝中原文化向西藏传播载体研究

一部清朝对西藏地方的赏赐文物史就是一部完整的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文化经营史。文章从文物文化视野角度,从佛教类文物、政治仪轨类文物、金银财帛类文物、日常生活类文物等方面详细分析了清朝的文化经营步骤,表明清朝的文化定位是准确的,并在边疆治理上实现了这一意识形态功用。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虽不自清代始,但是自清代更加紧密,中原文化的西藏传播虽不自清朝始,但是自清朝形成规模和格局。(李军,《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期)

安多强巴与藏族传统文化

安多强巴从小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藏族传统艺术的熏陶。传统文化是安多强巴的一个最主要的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他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以开放的探索精神对国内外的古今艺术、考古发现、科学理论进行了思考研究,形成了他的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艺术的理论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始终贯彻在他的艺术创作实践当中,使他成为了一位在西藏现代美术史上继往开来的杰出艺术家。(次旺扎西,《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期)

“白哈尔神”传入吐蕃时间考辨

作为目前藏传佛教格鲁派护法神之一的白哈尔神,何时传入吐蕃,是被“抢”到吐蕃还是被“请”到吐蕃的,学界还未展开详细的论述。文章结合藏汉文史料,对白哈尔神传入吐蕃的时间进行了考辨。认为,首先,从762—766年这一历史时期来看,在吐蕃大军压境,占领唐都长安之前,今甘青地区的吐谷浑政权已经被吐蕃灭亡,此后甘青地区已基本处于吐蕃政权的统辖之中。此时西北地区的局面是,吐蕃联合回纥、吐谷浑、党项、奴刺共同攻唐,而唐朝将领铁勒人仆固怀恩背叛唐朝,引回纥、吐蕃大军直逼京师。这一阶段因为吐蕃军事实力的强盛而在唐蕃关系之间处于主动和攻击的状态,回纥政权此时与吐蕃是联合攻击唐朝的。尽管在永泰元年(765)十月因郭子仪策反回纥,使吐蕃、回纥之间出现矛盾,但二者之间还处于猜疑期,关系并没有直接破裂,也没有发生军事冲突。故这一时期,吐蕃无需派军队在盟友手中,同时在军事上受唐朝支持、处于强势的回纥政权手中,“抢”白哈尔神到吐蕃。因此,于766年桑耶寺建成,白哈尔神传入吐蕃的说法不能成立。其次,从762—779年这段时间来看,唐蕃之间时战时和,而且唐朝逐步加强了在西北地区对吐蕃的防御,西北战场上双方处于“拉锯战”的状态。至大历十四年(779),唐蕃在西北战场相对稳定,但在西南四川战场吐蕃和南诏联合,三路攻唐边境。故而,在西北地区吐蕃与周围政权之间的关系因与回纥间的相互猜忌而处于互相观察形势的局面,其间关系也暂时处于相对稳固的阶段。因此,在这一背景之下,771年、774年、779年桑耶寺建成,吐蕃在其仍旧占据的河、晚故地,“抢”白哈尔神的说法也不成立。再次,从780—798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情况来看,因唐蕃间常年战争内耗很大,唐朝派出使节主动与吐蕃修好,吐蕃也将唐朝战俘及战死将领的尸首归还。自建中元年(780)始至建中四年,唐朝与吐蕃终于达成了“清水会盟”,关系暂时出现缓和局面,并且面对唐朝内乱不断,吐蕃主动请兵帮助唐朝出力平定内乱。之后,吐蕃因探到唐军虚实立即开始攻击唐朝,同时自贞元四年开始,西南地区的南诏、西北地区的回纥卷入到唐蕃关系之中。尤其是西北地区,贞元三年(787)之时,唐朝应允回纥骨咄禄可汗的求婚,贞元四年(788)回纥提出愿与唐朝联合攻打吐蕃的建议,唐、回纥正式联盟对吐蕃。这一时期,唐、吐蕃、回纥、南诏以及西北一些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开始复杂。在这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西北战场吐蕃与回纥联盟彻底瓦解,而互相攻击,尤其是790年左右,吐蕃发兵北庭,但因回纥政权的暴行,原属回纥的三支原突厥政权的旧部葛禄(铁勒人)、白服突厥与沙陀突厥三部都投降了吐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吐蕃的强大盟友回纥、南诏已经或准备附唐,导致吐蕃对结盟或者降部有了严重的防范之心。所以这三支属于突厥系统的少数民族部落投降了吐蕃之后,因吐蕃有了回纥与南诏两个盟友背叛自己的前车之鉴,故而不会轻易因其投降而信任他们。突厥部落投降后,吐蕃要求他们派质子、献国宝以表忠心也属常事。故而,790年,突厥部落投降吐蕃,但得不到吐蕃的彻底的信任而被吐蕃“抢”走其白哈尔神也在情理之中。而在790年之后,因回鹘(回纥)、南诏与唐朝为盟在西北、西南共击吐蕃,军事上吐蕃处于劣势,尤其在797年,吐蕃赤松德赞去世,牟尼赞普初继位时欲请和,但却遭到了唐德宗的拒绝。基于此我们以为797—798年,即牟尼赞普在位期间白哈尔神传入吐蕃的说法也不成立。综上,我们以为,790年吐蕃派军队“抢”白哈尔神的说法最接近事实。从史料记载来看,“请”白哈尔神到吐蕃更符合史实。(杨卫,《中国藏学》2017年第2期)